

罪责的审视： 透视战后初期德国文学界的“大争论”

张叶鸿

DOI:10.16077/j.cnki.issn1001-1757.2015.02.017

内容提要：本文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留在德国的作家与远在美国的流亡作家托马斯·曼之间“大争论”的史实。“大争论”集中讨论了德国人是否应对纳粹德国的行为负有责任。与托马斯·曼长期深刻反思纳粹产生根源相反，留在德国的作家对纳粹罪恶的原因更多持回避态度。托马斯·曼让德国人意识到不能刻意规避对这段历史的责任，对德国社会后来罪责根源的探讨产生持续影响。

关键词：托马斯·曼 罪责问题 “大争论”

作者简介：张叶鸿，清华大学外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与认知、当代文艺理论和德国文学的研究。

Title: Reflection on Guilt: The Great Controversy in Early Postwar German Literature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so-called Great Controversy spawned by literary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writers who stayed in Germany after World War II and Thomas Mann, who lived afar in the U.S. in exile. While most of the German writers equivocated about the cause of Nazism, Mann made a long-term, in-depth investigation of the emergence of Nazism, arguing that all Germans should be held accountable for Nazi Germany's crime. Mann's efforts have enabled his fellow Germans to see that a "moral collective guilt" can serve as a reminder of individu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His argument has exerted a longstanding impact in German society and has initiated the enduring cause of probing into the roots of Nazism.

Keywords: Thomas Mann, guilt, Great Controversy

Author: Zhang Yehong <zhangyehong@tsinghua.edu.c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100084). Her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literature and cognition,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and German literature.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经过去 70 年。相对于其它国家对战争历史的反省,今天的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省可以说是彻底而深刻的。当代德国文化并没有因与统治德国十二年的纳粹文化彻底决裂而产生文化意识形态上的混乱;恰恰相反,半个多世纪以来德国社会各种富有生命力的思潮很大程度上均建立在对以往罪责和教训的反思之上。但是在 70 年前,德国文学界对这一重要问题却有过思想上的激烈交锋。

1945 年 5 月 8 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结束,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十二年纳粹专政的结束,第三帝国意识形态大厦随之崩溃,德国的政治格局和文化状况由此陷入一种真空状态。整体社会生活处于严酷的“零点”(Nullpunkt)状态。所谓“零点”既包含外在物质生活,也暗示社会内在的精神状态,既有历史一幕被彻底击碎时面临的混乱与危机,同时也预示新一幕即将拉开时的希望。在此承前启后的历史时刻,德国社会需要正视历史、反思责任,从而把握新的发展机遇。

然而在面对纳粹政权何以产生的根源问题上,当时德国民众心态复杂。大多数德国人对自己在过往历史中的角色保持尴尬的沉默,处于社会文化中心的作家们尤其如此。作为德国社会精神力量的发掘者和驱动者,作家们的话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此时在德国国内的作家理应发挥指引作用,承担起总结纳粹政权历史教训的使命,促进民众的思想转变,重建德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但当时不少德国文化精英阶层的成员在深入剖析纳粹上台的社会基础,以及自身与纳粹文化的关联时都难免持自卫性的回避态度。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大量流亡海外的德语作家。他们在整个第三帝国统治期间一直用文学作品以及杂文揭露纳粹的暴政,积极思考“德国罪行”或者说“德国悲剧”产生的根源。在纳粹统治的十二年间,纳粹政权对思想文化的严密封锁阻断了留在德国的作家和流亡作家之间的联系。这些流亡在国外的德语文化界精英本应成为德国战后反思的新鲜血液,但由于战争刚刚结束时德国文学界经历的一场“大争论”(Grosse Kontroverse)使德国主流社会对持批判态度的流亡作家采取了排斥态度,影响了流亡作家在德国西部地区参与文化和思想重建的进程。这场德国文学史上以“大争论”著称的论战是在纳粹时期留在德国的作家与被国际社会视为德语流亡作家代表的托马斯·曼之间引发的。

一、托马斯·曼的反思

为了更好地理解当时留在德国国内和流亡在海外的德语作家的心理,有必要回顾一下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文学界状况。自纳粹统治以来,公开的批评已不再可能。之前魏玛共和国时期多种风格及流派并存的文学发展格局被完全打破,讽刺作品、报告文学和论战文章等,在 1933 年之后的德国丧失了存在的空间,只能在流亡文学中继续存在。

1933 年 1 月 30 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国家总理,德国开始了法西斯专政。纳粹上台后迅速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推行“一体化”(Gleichschaltung)机制。纳粹党在进行种族净化的同时,“一体化”运动也开始清洗文化领域。希特勒上台三个月后,纳粹德国开始了焚书行

动:不符合纳粹精神的书籍被从图书馆和书店的书架上拿下来扔进火堆,宣扬理性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以及自由派和现代派的作品都被焚烧。在纳粹执政的最初几个月里,不少已享誉西方文坛的作家就开始了流亡,例如托马斯·曼、亨利希·曼、布莱希特、德布林、斯蒂芬·茨威格等。1933年9月22日纳粹德国通过了《关于建立帝国文化局的法令》,从此文学作品的创作、流通受到了严格的监管,每个从事文学、艺术和新闻工作的文化人都必须是相应的文化局的成员才有权力从事自己的事业(里奇 81—84)。一切犹太作家和纳粹认为有异己思想的作家都被禁止从事创作,并且随时有生命危险。德语作家的流亡由此被迫大规模展开。在第三帝国统治的残酷而恐怖的十二年间,大约 5500 名德语文化人士流亡海外,其中几乎一半都是作家(Möller 51),德语文学界的精英绝大多数都流亡到了国外。

在第三帝国期间,托马斯·曼作为 20 世纪最具世界声誉的德语作家,代表着优秀的德国文化传统以及“非纳粹的另一个德国”的存在。这位 1929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政治上的态度曾经经历很大变化,由早期浪漫的民族主义逐渐向主张人道主义和民主共和思想转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早期,托马斯·曼的确有拥护战争的民族主义思想,并发表了为一战辩护的论著《一个不问政治者的思考》(*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 1918),认为战争保护了德意志的“文化”,主张国家和民族意志高于一切。然而随着一战的进行,他逐渐认清狭隘的民族主义带来的灾难,由此他的人文主义的民主倾向逐渐加强。到了魏玛共和国期间,他完全放弃了以往的民族保守主义思想,成为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为抵制右翼恐怖势力的猖狂,他强调文学的教育功能,呼吁德国社会要走向民主、回归理性。1933 年 2 月 10 日,托马斯·曼在慕尼黑做了题为《理查德·瓦格纳的苦难和伟大》(*Leiden und Größe Richard Wagners*)的演讲,以弘扬德国的市民精神,还原被纳粹歪曲的瓦格纳本真精神。此演讲之后,他就动身前往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和巴黎,进行一系列的演讲。此时,纳粹在德国国内的多项举措让他最终听从了兄长亨利希·曼、儿子克劳斯·曼和女儿艾丽卡·曼的建议,决定不返回德国,开始流亡生活。1936 年他在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下,公开宣布与纳粹决裂,他的公民权和国籍随即被纳粹剥夺。从那时起、直到二战期间,世界各地都能听到他反对纳粹暴政、呼唤德国人民回归人道主义的声音。纳粹日益猖獗的反人道行为更加坚定了托马斯·曼捍卫人道主义的反法西斯态度。1940 年至 1945 年,托马斯·曼通过伦敦的 BBC 电台的《德国听众》节目每个月向德国发表广播讲话(Stammen 46),他一直希望德国人民能通过自身的反抗斗争从纳粹政权下解放出来。

对于被纳粹的民族主义和暴力统治玷污的德国文化,托马斯·曼和其他德语流亡作家一样,向世界展示着被第三帝国否定和驱逐的优秀德国文化的存在。1938 年 2 月 21 日托马斯·曼离开欧洲踏上美国土地开始在新大陆的流亡生活时,他在纽约对记者宣布:“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我带着德意志文化。”如他在写杂文《希特勒兄弟》(“Bruder Hitler”)时的笔记中所写:“什么无家可归?在我所写的作品里就是我的故乡。深入在作品中,我感受着身在家中的一切舒适。它是语言,是德语语言和思维模式,是我的祖国和民族自身发展出的传统财富。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Achtung, Europa 440)。其字里行间体现出托马斯·曼高昂的自我意识:他的“故乡”是德国的语言和思维,他的思想和创作植根于德国精神和德语语言的伟大传统中。

托马斯·曼追溯德意志民族的精神传统,通过研究自身思想挖掘德意志民族的特点,他痛苦地看到德国这个以理性著称的民族,其民族性中的非理性成分成为纳粹滋生的温床。民族主义的泛滥是这个民族理性和道德的衰败。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国际环境的压抑和经济危机的绝望使德国社会充斥着浮士德式的冲动,再经过纳粹主义的蛊惑,民族主义不断

膨胀。以这样的思考为背景,托马斯·曼的晚期代表作《浮士德博士》(*Doktor Faustus*)就是一部讲述德国人灵魂史的不朽作品,它以高度艺术化的表现方式充分展示作家对德国悲剧产生根源的深入反思。二战刚刚结束,托马斯·曼于1945年5月29日在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面对美国重要的政界和新闻界人士,作了著名的题为《德国和德国人》(“Deutschland und die Deutschen”)的演讲。演讲展现了作家在《浮士德博士》里对德国民族性的描绘。通过对德国思想史的回顾,托马斯·曼试图对德国悲剧产生根源作出自己的解释:“并非有两个德国存在,一个邪恶,一个善良,而是只存在一个德国,他最好的部分被魔鬼用诡计附身变为邪恶。邪恶的德国即是善良被挟持,善良处于灾难、罪责和毁灭之中的结果”(279)。这恰恰是《浮士德博士》里主人公灵魂迷失的影子。在这次演讲中,托马斯·曼指出,所有的德国人都应对1933年至1945年以德国的名义所发生的一切负有责任。他从自身早期错误中反省德国民族性的弱点,承认自己以前在《一个不问政治者的思考》里拥护战争的浪漫民族主义观点对德国的民族主义泛滥也起了负面的推动作用。托马斯·曼总结道,对于纳粹上台以及战争责任,德国民族应共同承担,尽管这是痛苦的,但却是不可逃避的责任,包括他自己(433)。

二、托马斯·曼与德国国内作家的“大争论”

然而此时德国社会对法西斯的反省远远低于托马斯·曼的期待。在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天,托马斯·曼在日记里抒发了他听到纳粹政权结束时的真实感受。托马斯·曼一直祈盼纳粹政权的结束,但这一刻到来时他并没有无比的兴奋。对于能否与纳粹决裂、彻底剔除纳粹产生的根源、如何重新回归正义和人性的文化重建的前景问题,他带有深深的忧虑。日记中的感叹影射出他当时复杂的心情:

德国宣布投降。这难道不是最值得庆祝的一天?难道不应为此而感到无比的振奋?……但是到现在都没有任何与纳粹彻底决裂的表现,没有明确的言语指出纳粹上台是可怕的灾难、对纳粹的容忍和包庇是最大的犯罪。对纳粹在国内和国外恶行的谴责和唾弃、对真相的宣布、对正义和人性的重新回归,这些又在哪里? (*Tagebücher* 200)

纳粹政权垮台后,托马斯·曼最早在德国公开发表的文章是1945年5月18日《巴伐利亚州报》(*Bayerische Landeszeitung*)上以《托马斯·曼谈德国罪责》(“Thomas Mann über die deutsche Schuld”)为题的文章,文中清晰地指明了德国发生的暴行的不可宽恕性:“失败把德国人的耻辱暴露给全世界”(*Meine Zeit* 375)。作为远在大洋彼岸生活的反法西斯著名人士,托马斯·曼没有回避这耻辱是“我们的耻辱”,“可耻的曝光已触及到所有用德语说的、德语写的、德语环境下生活的各个方面”(375)。

然而托马斯·曼的勇气以及对德国精神的强烈批评并没有得到德国国内同行的认同,“大争论”也由此开始。“大争论”是以1945年8月4日由瓦尔特·冯·莫洛(Walter von Molo)最早在《黑森州邮报》(*Hessische Post*)上登出的写给托马斯·曼的公开信为开端。冯·莫洛的这封信并非只是写给托马斯·曼的私人信件,而是面向德国公众,并在多家报纸刊出。^①在这封公开信中,冯·莫洛间接否定了托马斯·曼“耻辱触及到德国的一切”的观点。他的信隐含着这样的信息:“德国耻辱”要由希特勒政权来承担,德国民众只是这个政权的牺牲者,不应“对德国耻辱”负有责任。他进而呼唤托马斯·曼“带着这十二年强加给我们所有的压制”,

“您尽快回来吧。您能透过人性,给践踏的心灵以慰藉”(qtd. in Grosser 19—20)。冯·莫洛在1933年前曾是著名作家,曾任普鲁士科学院文学部主席。托马斯·曼当时也是科学院文学部的成员,他们两人在魏玛共和国期间曾多次共同致力于文化改革政策的实施。希特勒上台后,冯·莫洛离开公众视野,退回到自己的庄园,在那里一直生活到战争结束。在战争刚结束这个一切都在未知和混乱的时刻,冯·莫洛的话无疑得到了留在德国的文化精英们的认同。所以这封信一经登载,便被德国各报反复刊出,并且被转载到美国、英国、瑞典和南美的媒体上(Grosser 21)。公开信不仅向公众表明了写信人的立场,同时也给收信人施加了不小的压力。

还没等托马斯·曼回复,作家弗兰克·蒂斯(Frank Thiess)就冯·莫洛的信在8月18日慕尼黑的报纸上发表了题为《内心流亡》(“Die Innere Emigration”)的文章。蒂斯自称在第三帝国成立初始就曾使用过“内心流亡者”这个词。^②对于蒂斯是否最早提出“内心流亡”,学界尚无研究定论(Philipp 11)。蒂斯在这篇《内心流亡者》文章中描述了德国境内作家的处境,他指出:在纳粹执政期间,从事写作的作家可以非常清晰地分为追随者和所谓“被怀疑者”。蒂斯在这里特意强调内心流亡作家的心灵世界是希特勒政权用各种办法也无法达到的。对于内心流亡者的艰难之处和特殊贡献,蒂斯写道:“我经常被问道,为什么没有去流亡,我能做的回答总是同一个:如果我能在亲身经历这个可怕时期后幸存下来,我必会获得许多精神和人性上的成长”(qtd. in Grosser 24)。蒂斯进而对托马斯·曼多年通过BBC向德国发布的广播含沙射影道:“我相信,在这里保持品格要比从远方向德国人民发送报道更为艰难”(24)。蒂斯用“懦弱的唯美主义”形容那些国外的流亡者。在他眼里,流亡国外的人只是做了这场灾难的观众,他作为内心流亡者的代表对德国的状况远比那些只在“国外的剧院包厢和正厅”里观看“德国悲剧”的人更能深刻体会(24)。蒂斯认为留在德国的作家也是纳粹政权的受害者。他将帝国写作局^③几乎所有成员都归为内心流亡者,无疑是很有争议的。如此滥用“内心流亡”概念,大有为自己辩护和免除心灵债务的工具化倾向。在文中,蒂斯对海外流亡作家实际生活状况(故作)无知,其诋毁性的语调不能排除他本人希望战后在文化重建问题上占有话语权的个人目的。^④蒂斯的参与使留在德国的作家和以托马斯·曼为代表的流亡作家在心理上和道德上对立起来,对话立刻上升为政治原则问题的争论。

近两个月后,托马斯·曼才写出了回复冯·莫洛的信。在这期间,他的日记展现了内心各种复杂的心情:恐惧、绝望和对故乡的怀念。1945年9月28日在纽约著名的流亡作家杂志《构建》(Aufbau)上,他发表了题为《为什么我不返回德国!》(“Warum ich nicht nach Deutschland zurückgehe!”)的文章。文中托马斯·曼对1933年德国知识界没有进行一场总罢工感到非常失望。他没有理会蒂斯的“内心流亡”这个词,相反他认为1933年后继续留在德国从事写作的作家是“与纳粹共舞,在服侍魔鬼”(Meine Zeit 36)。他毫不留情地说:“也许这是成见,但在我眼里,1933到1945年在德国还能出版的书,比毫无价值还没有价值。把这些书拿在手里就是罪恶的。一股血腥和耻辱的气息附着在它们上面。它们全都应该被捣烂”(37)。

托马斯·曼的这种笼统批判,即认为1933年后出版的作品带有“一股血腥和耻辱的气息”,迅速引起留在德国的作家们强烈不满,由此引出了一系列情绪激昂的驳文。相对其它情绪化和个人攻击式的回复,威尔海姆·豪森斯坦(Wilhelm Hausenstein)的文章显得最有说服力。豪森斯坦可以说比蒂斯更具“内心流亡”的特点:1936年被剥夺写作权,1945年2月与其犹太血统的妻子一起被驱逐。1945年豪森斯坦在德国最有影响的日报之一《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上发表了《没有血和耻辱的书籍》(Bücher – frei von Blut und Schande)

一文。他用很长的篇幅客观地列举了一系列作家的作品,指出托马斯·曼认为纳粹时期所有出版物均毫无价值这一观点的“过分简单化”(qtd. in Grosser 71)。豪森斯坦写道:“这些书存在的本身就是对希特勒主义的否认”(71)。这些书主要涉及宗教、文学史和艺术史,还包括在纳粹期间翻译介绍到德国的“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72)。接着,豪森斯坦指出这些书能够出版,是因为“作家和出版社要有所需要的勇气和刚正不阿的精神,才能在严肃书籍中忽略‘第三帝国’意识形态,对‘第三帝国’绕道而行。这需要难以估量的道德上的坚持和精神上的紧张”(72)。针对托马斯·曼信里的潜在要求:一个正直的作家不应在纳粹政权下写作和出版。豪森斯坦认为在纳粹政权下,人们恰恰希望读到好的、远离纳粹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73)。在这场争论中,对德国悲剧产生根源的追问已完全被留在德国的作家们自卫式的辩护所取代。

在这场论战中,托马斯·曼只有少数的支持者。1946年1月26日,从苏联回到德国的、时任“德国民主振兴文化联盟”(Kulturbund zur demokratischen Erneuerung Deutschlands)主席、著名左翼诗人约翰内斯·贝歇(Johannes R. Becher)以联盟主席的名义给蒂斯写了封公开信,希望身处德国国内的人士理解托马斯·曼的境况。他指责蒂斯对海外流亡者的普遍状况,尤其是对托马斯·曼的处境认识完全错误。尽管他非常遗憾托马斯·曼对留在德国的作家没有给予必要的理解,而且没有决定回到德国,但他也承认冯·莫洛对托马斯·曼立刻返回德国的公开要求显得过于仓促。他在信中希望内心流亡和海外流亡的德国作家在心理上逐渐走近,这样才能使纳粹主义在德国没有再生的可能(qtd. in Grosser 97—102)。可惜这样的希望随着西方和苏联两大阵营的建立而落空。

三、透视“大争论”

这场1945/46年间由留在德国的“内心流亡作家”与远在美国的托马斯·曼之间展开的“大争论”以托马斯·曼是否回国为起因,争论的中心议题很快上升为留在德国国内的人们是否对纳粹德国的行为负有责任?谁来承担德国的罪责?留在德国的人士是纳粹的“同行者”、还是纳粹政权下的“受难者”?谁对经历十二年炼狱的德国现状更有发言权?谁又更有资格代表德国文化:是流亡海外的托马斯·曼们、还是在纳粹暴政下生存的作家?争论的中心议题一定程度上由“纳粹灾难为什么会发生”的深刻反思转向人事之争,甚至互相指责。

这场“大争论”凸显出战后德国西部(原西德)社会对反思刚刚结束的纳粹灾难的回避态度。思想文化界精英们本应在这一时期,引导社会反思和讨论法西斯产生的根源、德国罪责的原因,以及个体的责任,以促使德国社会向文明进步的方向转变。然而很多留在德国的作家对于自我在纳粹政权中的行为判定有着复杂的心态。他们深知这会影响到自身在新的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从蒂斯的文章中可以读出,自诩为“内心流亡”作家中的成员比身居国外的流亡作家有着显著优势,对“德国的形势”更具发言权和主导权。像蒂斯这样认为自己更具有对国家命运的发言权的德国文化人士并非个案。这些人在思想上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认识上表现出相当的局限性。这表明,当时战后德国依旧笼罩在复杂的“后纳粹主义”氛围中。

托马斯·曼则有明显的不同。他在流亡期间一直试图探求,为什么被他视为创作土壤和精神家园的德国文化会让疯狂的纳粹思想得以发展?面对故国发生的一切,托马斯·曼一直在思索这场自我毁灭的悲剧根源,追问在魏玛共和国,甚至更早年代里潜藏的纳粹源头。二战结束前后,托马斯·曼不断试图唤起德国人企图规避的责任感。他认为德国此刻所处的灾难是咎由自取,德国的悲剧是德国民族中非理性的民族主义造成的。这一观点与战后德国社会

的普遍认知截然相反:当时的德国主流文化认为德国人不是纳粹的帮凶,而是被这个政权奴役的牺牲品。托马斯·曼的言论与创作让德国人意识到,不能刻意规避历史责任感。但遗憾的是,托马斯·曼完全否定 1933 年后继续留在德国从事写作的作家对纳粹的抵制和内心的抗争,削弱了他反省纳粹罪行的群众基础。尽管如此,他反思的深刻性也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

在 60 年代整个德国社会政治化的大背景下,战后出生和成长的联邦德国新一代不惮直面二战中的民族耻辱,勇于揭开被回避的历史伤痕,大胆质问父辈们对纳粹政权的姑息顺从。不难看出,这与托马斯·曼在战争结束时问罪德国的气度有一脉相承之势。反思历史教训是为警示现实。如德国前总统冯·魏茨泽克于二战结束 40 周年时在德国议会上的讲话:“谁对过去闭上眼睛,就会在现实中成为盲人”(von Weizsäcker 6)。这也是托马斯·曼在战争结束时所担忧的:如果德国民族不愿深入反思造成纳粹历史的原因,那么就会面临重蹈覆辙的危险。

正视历史,需要勇气。反思责任,务求真诚。二战后德国文学界的“大争论”留下了历史的印记,给后人以启迪。只有直面历史,才能创造历史。

注解【Notes】

- ① 之后 8 月 8 日在《柏林汇报》(*Berliner Allgemeine Zeitung*)、8 月 13 日在《慕尼黑日报》(*Münchener Zeitung*)刊出。
- ② 1933 年纳粹的焚书中,蒂斯写的两本书也被焚烧(《该诅咒的人》(*Die Verdammten*)和《抢女人》(*Frauenraub*)。他自称曾写信给当时帝国文化局负责人辛克尔(Hans Hinkel):“这种焚书的行为没有任何用处,因为德国最好的作家不会因为禁令和外在的压力而放弃他们的本质,最终他们没有其它的选择,只能成为内心的流亡者”(Grosser 22-23)。
- ③ 为控制文化生产,戈培尔于 1933 年 11 月正式建立帝国文化局。帝国写作局是帝国文化局的七个下属部门之一。所有的犹太作家和纳粹认为有异己思想的作家都被排斥在帝国写作局之外,不能从事作家职业,并随时面临迫害。
- ④ 这一点还可以从蒂斯之后的一系列文章中得到印证(Thiess 267-301)。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 Grosser, Johannes F. G., ed. *Die Grosse Kontroverse: ein Briefwechsel um Deutschland*. Hamburg: Nagel, 1963.
- Mann, Thomas. *Tagebücher 1944-1.4.1946*. Ed. Inge Jens.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86.
- . *Achtung, Europa! 1933-1938. Essays, Bd. 4*. Ed. Hermann Kurzke and Stefan Stachorski.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95.
- . *Deutschland und die Deutschen 1938-1945. Essays, Bd. 5*. Ed. Hermann Kurzke and Stephan Stachorski.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96.
- . *Meine Zeit 1945-1955. Essays, Bd. 6*. Ed. Hermann Kurzke and Stephan Stachorski.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97.
- Möller, Horst. *Exodus der Kultur: Schriftsteller, Wissenschaftler und Künstler in der Emigration nach 1933*. München: Beck, 1984.
- Ritchie, James MacPherson. *German Literature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 Trans. Meng Jun. Shanghai: Wen Hui Publishing House, 2006.
- [詹姆斯·里奇:《纳粹德国文学史》,孟军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 年。]
- Philipp, Michael. “Distanz und Anpassung. Sozialgeschichtliche Aspekte der Inneren Emigration.” *Exilforschung*.

Ein Internationales Jahrbuch. Bd. 12. München: Text u. Kritik, 1994. 11-30.

Stammen, Theo. "Thomas Mann und die politische Welt." *Thomas-Mann-Handbuch*. Ed. Helmut Koopmann. Stuttgart: Kröner, 2001. 18-53.

Thiess, Frank. *Vulkanische Zeit. Vorträge, Reden, Aufsätze*. Neustadt: Corona, 1949.

von Weizsäcker, Richard. "Zum 40. Jahrestag der Beendigung des Krieges in Europa und der Nationalistischen Gewaltherrschaft." Ansprache am 8. Mai 1985 in der Gedenkstunde im Plenarsaal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Bonn, 1985.

(责任编辑:徐蕾)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美文学研讨会暨 2015 年文学理论与解读讲习班通知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将于 2015 年 7 月 22 日—24 日在安徽黄山市举办为期三天的英美文学研讨会暨第五届文学理论与解读讲习班,继续邀请国际知名学者、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杰出教授”、杭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刘军(童明)老师主讲,外国语学院殷企平、李公昭、陈正发等资深教授将参与研讨。

2011 至 2014 年,刘军教授主持的讲习班已在杭州连续举办四届。四年期间,刘教授以理论、文学和历史互为经纬,探讨了柏拉图、尼采、弗洛伊德、启蒙、悲剧、解构、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互文性、翻译学、女权主义、心理分析等各种理论问题。并针对大学外国文学教学的需要,引导学员细读十几种西方诗歌和小说文本,还涉及本心文学作品及其翻译。刘教授讲课,严谨专业,自由潇洒,妙趣横生,熟练运用审美判断来引导大家突破宏大话语,跳出框框,思辨启蒙、现代性、文学和文化各种问题。

2015 年的暑期讲习班将由黄山学院承办,在空气清新的黄山学院举行。刘教授每年的讲座主题都有所更新,今年的主题包括:(1)中西比较异同交叉的方法;(2)中西比较和解构;(3)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诗感的变化;(4)海明威小说的现代性;(5)诗歌形式和内容的统一;(6)童明散文的中西互文(二例)。

报到地点:黄山阳光酒店(黄山屯溪区西海路率水桥南 20 号,黄山学院南区对面) 电话:(0559)2568888

报到时间:2015 年 7 月 21 日下午 13:00—17:00 研习时间:2014 年 7 月 22 日至 24 日

会务费:1000 元(研究生凭学生证 600 元),期间食宿费用自理

联系方式: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姜琼玮 0571-28865248 13588435359

陈光乐 0571-28865235 18758859055 电子邮箱:wgkyxx@163.com

有意参会者请将报名表发至电子邮箱 wgkyxx@163.com,报名截止时间 2014 年 6 月 15 日,刘军教授简介详见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网站 <http://wgxy.hznu.edu.cn/>。